

感受扑面而来的工业热潮

陈可非



就是想写一点基层官兵喜爱看的作品。于是，我的创作完全浸泡在这个舒适区内，虽然未能写出什么惊人之作，但也收获了诸多喜悦。

几十年岁月匆匆，我没想到，临近退休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一群与我过去的生活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成天跟机床打交道，跟焊枪打交道，跟钳子、扳手打交道，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他们那种不同的生活让我心中顿生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好奇，甚至产生了想写写这个群体的想法。然而，我对他们的生活知之甚少。

好在我的妻子就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我的岳父岳母就曾在一个国营大厂做工。那里是一个我陌生而熟悉的存在。陌生的是对那里的生产运行丝毫不知，只看见所有人都很忙碌，却又忙碌得按部就班。而熟悉的是，我亲眼见到这个庞大“家庭”在几十年里经历的无数兴衰与更迭，以及这里的人们所经历的苦辣酸甜。也正是这些，为我打开了一扇理解中国工厂、工人的窗口，从而也奠定了我对中国工厂、工人的情感底色。

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就是一个追求自由的过程。可现在，我将进入一段我所不熟悉的生活，如何才能获得创作和想象的自由呢？我不能确定。但我知道，首先得用真心真诚地去感受，得热烈而赤诚地去爱。

于是，我走出创作舒适区，进入到工业题材这个陌生领域，虽然内心忐忑不安。令我意想不到的，当我

一脚踏进这个陌生领域，看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场景，听到了新奇、别样的故事，突然发现，这些场景和故事顿时将我的文学想象引入另一条河流，而且是一条通往大海的河流，它彻底拓宽了我以往的经验，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空，让我的想象在这片天空里自由翱翔起来。

军营和工厂本身有着极大的差异。起初我担心，这种差异会像沟壑一样阻隔我惯常的创作构想。而恰恰相反的是，这种差异性创作体验，不仅没有束缚我的想象，反而给我带来莫大的新奇感。如今，中国制造在世界大放异彩。通过短短几十年的努力，中国从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华丽转身为工业制造大国，并不断向工业强国迈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你走进一个个偌大的车间，当你面对庞大的现代化生产设备，你才能体会到这一点。

这种扑面而来的工业热潮，像长河巨浪，冲击着每一个人，影响着每一个人，感召着每一个人，改变着每一个人，作家当然也不能例外。正是这种直面的撞击，迫使我一头扎进这片工业湖水中，回望、追寻几十年来中国工人走过的历程，以及他们的挣扎、泪水、成功和欢笑。这种时代工业的发展大潮，也成为我认真、坚定地完成这部作品的原动力。

正是有了差异性的创作体验，遭遇了时代工业的直面撞击，我捕捉到了灵感，从一个小国营工厂出发，完成了对中国工业几十年来发展的追溯与回望。这是一个闪烁着人性光芒、

却又平凡英雄群体，我没法不敬仰他们，我愿意跟他们一起欢笑、一起流泪。我要写这种人性的光芒。当我想到此时，一群人物便从工厂的各个角落走了出来，他们带着历史的烙印，带着不同的个性，带着中国工人特有的气质，来到了我的眼前。我要书写的正是他们。

如今的中国，真正的工业文明时代已经到来，如果工业文学仍处于某种观望和等待之中，显然就是文学落后于现实了。文学其实是不需要区分为某某文学的，文学是写作者对世界的想象和看法。文学毕竟是写人的，只要回到了人的本位中，无论什么文学，同样都会打动人心。如果非要区分不可，那么，工业文学同样是写作者对世界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工业文学显得更加亟需和迫切。在这个蓬勃的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学理应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向之一。

当然，这是一条漫长的路，如同工业产品的革新一样，需要在尝试中历经无数失败才能获得成功。文学没有弯道超车，只能一步步地探索前行。能在长篇小说《锦年》创作中，对工业文学做一点粗浅的尝试和探索，无论成功与否，我都深以为幸。

（作者系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



立河道清理公司，助力新区生态恢复。更重要的是，夏向上在创业路上始终坚守底线，面对严竣继续投入以获取国家拆迁补偿的投机计划，夏向上断然否决。在他看来，“长远的眼光与格局”才是建设雄安的根本。夏向上等人对雄安新区发展方向的精准预测，体现出他们作为时代新人对时代精神内核的准确把握。

作为一部以雄安新区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向上》谱写了一曲锐意进取、切中时代脉搏的“青春之歌”。在《向上》中，我们既能看到“千年大计”的宏伟蓝图，也能看到青年个体在时代变革中的奋斗与迷惘。《向上》勾勒出人与时代共同成长的轨迹，让读者在个人的故事里，感受到时代跳动的脉搏。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社会逐渐改变了这种关系网络，人们之间的连接从有温度的、近距离的变成隔着手机屏幕的、远距离的虚拟接触。罗伟章的《屋檐》借此唤起我们对重建真实连接的思考——这种困境本身也催生了新的互动形式与情感回归的可能。作家从日常生活中的居住问题，发现了两代人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话。

罗伟章用脑为小说谋篇布局，用心为小说铺陈因果，让小说具备了 中国儒家传统中备受推崇的温柔敦厚，无论是孙进宇从前的经历，还是他对着房客们的讲述，都充满“温良恭俭让”的气质。《屋檐》不是苍凉的寓言，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给我们无限希望，让我们相信“人是需要与人交往带来温度的，这种温度终究会成长为支撑人们的精神支柱”。

从《声音史》中杨浪用声音储存变迁的村庄，到《谁在敲门》中书写一个大家族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变迁，以及《红砖楼》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求索，罗伟章始终在做同一件事：用日复一日的写作，寻找对抗孤独的良药。这是在传统和现代文明更替之际，对两种文明做出深度思索之后，向传统文明的温情致敬和对现代文明的积极接纳。他的文字提醒我们，每一次变迁都孕育着新的生机，而人性的温度，终将在碰撞与融合中焕发出更坚韧的光亮。

（作者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

徐兆寿兼备作家与批评家双重身份，他一手写长篇小说、诗歌、散文，一手写文学评论，这使他的批评文字时常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徐兆寿的新著《精神的维度》（人民文学出版社）某种程度上昭示了文学批评的另一种可能，即文学批评亦可成为兼具思想性与审美性的精神创作。

在《精神的维度》中，作者以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为出发点，着力探寻文学批评的思想深度与精神广度。徐兆寿把自身经历带到文学批评现场，从自我经验的总结到学生写作的训练，再到对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他反思学术训练的局限，讨论写作规范对于才华的抑制，进而将文学批评提高到思想的维度。作者一方面追求艺术的审美与“思想的自由”，另一方面则兼及“时代的气场”与当下的现实。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批评路径，打破了固有的学院派范式，转而强调从生活现场中提炼真问题并赋予其理论回应，使批评更具现实针对性与思想穿透力。在《精神的维度》中，随处可见的是对学生的指导、和学生的交流，但更多的是自问与反思。作者思考文学，既深入到中国文化的传统，将问题的源头追溯到《诗经》时代，又回归到身体诞生的那一刻，叩问具身性的情感、心灵问题。诸如“文学何为”“伟大文学的标准”以及“人是什么”的终极追问等，都是作者关心的问题。这一切的讨论与思考让文学批评有了切身的现实感受力和具身的现场参与感，促使读者在思考中将问题引入对文学本质与社会功能的深层探究，也推动文学批评在更深的层次上实现精神维度的拓展与价值重构。

在《精神的维度》中，作者追求一种美文批评文体。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的一种，其独立性往往备受质疑，这既缘于批评与创作两者表达思想的方式不同，批评偏重于理性的张扬，创作侧重于感性的抒发，更重要的是文学批评常常被视为文学鉴赏，缺乏其自身的文体意识与审美价值，很难在大众读者中产生类似于文学作品的共鸣与传播效应。但是徐兆寿在《精神的维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批评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并且他还强调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共性，诸如“真诚”“优美”“深刻”“气广”等特质，都是二者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所以他更愿意以“理性的激情”来概括文学批评的美文品性，即在严谨论证中保持诗意的表达与情感的投入。在对学生论文写作的指导中，他明确地感受到“学术八股文”对于文学批评的伤害，他视学生在写作中那“真切的感觉”，借助文学批评的经典范例来引导学生获得“美文”应具有“对时代的把握、深入的阅读、真诚的批评、深刻的人生体验、广泛的艺术修养”能力。作者呼唤文学批评“首先应该恢复其鲜活的与时代贴近的形式，要解放其僵死的形式，然后要与时代接轨，最后要养气、提气，使文学评论拥有鲜活、独立、自由的品性。”这既可以视作徐兆寿对文学批评审美特质的理解与文体自觉，也是其对文学批评美文理念的生动诠释与根本宣言。

究其根本，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始终坚持以人心为核心的批评理念。“文学是人学”已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十月》举办“译界”专栏分享会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颂歌与宿墨——《十月》‘译界’专栏暨《宿墨与量子男孩》分享会”于北京举办。诗人欧阳江河、翻译家田原等围绕日本诗人高桥睦郎长诗《颂歌》译本与欧阳江河诗集《宿墨与量子男孩》展开对话。

田原介绍，高桥睦郎是日本百余年文学史上少有的同时精通现代诗、俳句、短歌，还能以古日语创作能剧剧本的全能型写作者。《颂歌》翻译难度大，涉及大量神话典故，他

真正的批评要拆解『人心之变』——评徐兆寿《精神的维度》
许永宁



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人学”是什么往往莫衷一是，一些批评文字或流于概念的空洞阐释，或偏于技术化的文本拆解，鲜有直抵人心的精神叩问与现实关怀。徐兆寿在《精神的维度》中将文学的“人学”归位于“人心之学”，他认为“文学即人心之学。文学来自人心，归于人心”。这一论断不仅还原了文学批评的情感本源，也重塑了批评活动的人文坐标。他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追问“人在哪里”，在历史的书写中追溯“人的历史”，在艺术的正声中探讨“音乐对人心灵的影响”。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指向徐兆寿对人的主体性的关切与思考。缘何如此？在他看来，“文学的自由即人的自由”，人的自由即人心的自由。所以，他对“人心”的理解不是众人对“人性”的理解那般空疏，而是建立在一个具体可感的生命本体之上，以“自由意志”作为其内核。比如，在贾樟柯的《山河故人》中，他感受到人物的“身体隐喻”，从而理解“个体的孤独”与时代之变中的群体共鸣。他认为“真正的人之为人的精神之变，是礼仪道德的生、旺、衰、死和再生之变，是人心之变”，“人心”之变构成了古往今来文学演变的内在动力，也是批评真正介入生命与时代的通道。基于当下的文学批评现状，他认为“文学重新与社会、与人生建立更为亲近的关系”至关重要，回到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点，文学批评才能真正触及人心深处，实现其应有的精神价值与社会意义。

徐兆寿在《精神的维度》中给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学院派文学研究的批评景观与精神气象，将文学批评的方法、文体与理念有机融合，既是当下文学批评新路径的一次尝试，也为批评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与博士生刘沐旸耗费大量心力完成了译稿。

欧阳江河认为，高桥睦郎的诗歌将决绝阳刚的力量与优雅阴柔的质感融为一体，文本内部充满反向撕扯的语言张力。自己的长诗《宿墨与量子男孩》驱动力并不来自激情与抒情，而是聆听如地质断层一般沉埋于文本之下的持续低音。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十月》杂志社在2026年“我与地坛”北京市书期间推出的系列活动之一，也是第十一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活动之一。

与世界一同成长

——评何常在网络小说《向上》

冯跃华

主营手机贸易，紧跟市场浪潮；80后温任简坚信知识的力量，矢志不渝投身科学研究，女性人物单一糖立足人力优势成立制衣厂；90后夏向上返乡投身新区建设、生态农业发展……这群生于三县、长于三县又远离三县的创业者，最终又汇聚于雄安，共同推动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从“深圳速度”到“雄安质量”，何常在不仅是在书写几代人的个体奋斗史，更是在描绘几十年来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史。

这种将个体人物命运与国家发展进程同频共振的写法，让《向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在《向上》中，成长不再是主人公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巴赫金语）。当夏向上站在时代的拐点，他的精神蜕变和广阔的社会产生了共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向上”从来不是单纯的空间指向，而是被赋予了“成长”的维度。“向上”不是简单的空间位移，而是一种与时代共振的精神气质。

罗伟章小说中的传统与现代之间

崔耕

动的，易变的，正如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不同的两种形态。而这两种文明形态的并存，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依然生机勃勃的关键。《谁在敲门》中的父亲像山，形态稳固，不想改变，连去镇上住都会因不适生出各种病症，这正是乡土文明面临调适和改变的隐晦。需要看到的是，恐怕他们已经身处“河的文明”，“山的文明”也依然深潜于我们的生命，不时显露出它坚硬和稳固的底色。

《红砖楼》则用带有深刻反思精神的书写，讲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如今，东轩市的作家、艺术家聚集在一幢显眼的红砖楼中的故事。小说通过主线故事展现他们对创作初衷的追寻和意义感的重建。红砖楼是一个象征，它既是作家们聚集的地方，也是他们精神自省和自我重塑的场所。小说中的前辈作家冉强与年轻人盛华的相遇，揭示了个体如何寻找自我、坚守本心，以及他们如何面对内心的恐惧、惰性和利益考量。罗伟章在《红砖楼》中用现实主义手法，审视知识分子群体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处境与心理状态，并探寻精神突围的可能。

《屋檐》从居住这个朴素的日常主

题入手，讲述两代青年人的居住困境。居住是人类在世最基础的生存需求之一，20世纪80到90年代，中国还未大规模出现商品房，住房几乎靠单位分配，很多年轻人正如《屋檐》里的那样合住在一起。无独有偶，当代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也有很多选择与陌生人合租。《屋檐》以温柔的笔触，写出了不同代际的年轻人在相似的存在境遇中面临的不同精神困惑。小说主人公孙进宇等人，面临的主要是逼仄的外部环境对个体生存的挤压。密不透风的住宿条件带来的是几乎丧失个人隐私的生活，但同时，这些困难也促成了人与人之间密切的精神连接，整个社会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昂扬的情感基调给青春的惆怅带来一丝“茂美和轻盈”。

而当代年轻人普遍承受着传统儒家“差序格局”在现代性语境下的转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这种“差序格局”有精妙的论述，它指的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由血缘、地缘、业缘层层推展的网络关系。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而身处网络的中央，人会感到人际关系带来的稳定感和安全感。现代